

红色家族



张秀章 李刚◎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红色家族

I247

(二)

10233.2

张秀章 李刚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十 宋哲元组“自治”华北危急 李常青建“市委”组织民众

1935年7月5日上午，李常青按照预约的时间，提前来到中山公园，按理说，这个季节早就游人如织，欢声如潮了，可眼下外敌入侵，华北正危在旦夕，人们惶惶不可终日，哪还有游园逛景的心思呀！这里倒成了背静的地方。

李常青看看腕上的表还有一刻钟，便顺着游廊转到坛边上，眼望“中山堂”的匾额和五色土的坛面，心里不觉激荡起来；总理所创的共和现在自张学良“易帜”后，算是“统一”了，可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蒋介石集团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和对人民的横征暴敛，加之全国各地连年灾荒，黄河大水，陕西酷旱，真是哀鸿遍野，饿殍塞途，国家将亡了！……

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河北省只保存一个省委组织的严峻关头，经中共中央决定将北方局与河北省委合并。今天，李常青是以北方局兼河北省委特派员的身份来到北平主持抗日救亡工作的。

他见时间快到了，便来到接头地点——“来今雨轩”。他捡个雅座，要了一壶茶，坐在那儿慢慢地品味着。茶房看这斯斯文文的老者很懂得茶道，便生几分敬意，热情地招呼着：

“老爷子呀，您老高寿哇？”

李常青今天是一身的老学者打扮，而且还留着胡须，戴着一副茶色金丝眼镜。

李常青听到茶房的问话，抬起头，眯缝着眼，捋了一下胡须，笑着伸出手指，先一个6，接着一个3。

茶房奉承道：“人过花甲还这么硬朗，实在难得耶，您老是自个吗？”

李常青拿着老腔老调：“谢您照应啦，我在等两位茶友哪，还须您费心呢！”

茶房心想，这是位好老先生，挺客气哩，便说：“好来，您先慢慢品着，您两位贵客来时，随便招呼一声就得！有事尽管言语，别客气，我去去就来。”说完，就到别的桌上照顾茶客去了。

不多会儿，来了两个一胖一瘦的人，刚一进门，茶房迎上招呼：

“二位请——”

“我们是慕名而来，应邀而至。”

茶房一听，喜上眉梢，说道是，满大个公园只有他这里客多，这老字号确实有些来头，文人骚客、名流雅士多来于此。茶房听“应邀而至”心里明白，便在前引路，非常客气地把他们两位领到李常青所在的雅座间。

来者是彭涛、周小舟。

彭涛见李常青如此打扮，甚为惊讶，张着嘴，欲笑不能。周小舟却不以为然，他已司空见惯。见了面，彼此高声寒暄一阵儿坐了下来，接着是品茶，边喝边谈。

李常青小声传达河北省委的决定：

“目前形势万分危急，民众要求抗日救亡的情绪很高，可组织却遭到破坏，为了加强领导，河北省委特派我来北平。今天仅是个接头，至于下步怎么搞，是否开个会？”

彭涛说：“我们正急得像热锅的蚂蚁，赶紧开会研究一下吧！”

“那好，”李常青说，“后天下午3点在饽饽坊8号碰头。对了，这地点你俩知道吗？”

“不就是府右街那个吗？”

“对！请你俩分头通知一下黄敬、姚依林、郭明秋几位也到会。李常青抬眼望望雅座外面的动静，补充说：“我先打个招呼，首先要把市委组织起来，根据省委决定，可叫做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彭涛同志，请你先物色一下人选；另外党的外围组织方面工作，周小舟同志，就由你先拿出个方案。好，我说完了，你二位还有什么意见？”

“没有。”

“服从安排。”

“那咱们就再喝一会儿茶，你俩先走，一定要小心。”

片刻，3人起座。彭、周先行告退，李常青多给了茶房几个小费便道别，慢慢地向外面踱去。

出了中山公园门向西走不远，他觉察后边拖上了一只“尾巴”。心里暗笑：好，我倒要与你玩玩。他依然慢慢地踱着步，“尾巴”慢慢地跟在后面，相距有四五十米，快到南长街口时，常青泰然停下，慢悠悠儿地蹲下身系老“北京棉”的鞋带儿，“尾巴”老远也停下来，装着回头张望，怕常青发觉。常青乘机一下拐到南安街一顿神跑，你可知，他在东北延吉念书时是长跑健将呢，虽然近年身体不太好，常闹胃病，可不减当年。跑到一个胡同斜插进去，又钻入一个厕所，三把两把，将胡须扯掉，把脱下的长衫塞到檐下，把那副金丝眼镜一摘，微驼的脊背一挺，迈着潇洒的步履，走了出来，迎面碰上跑得气喘吁吁的“尾巴”，这“尾巴”扫了一眼，擦身一直向前跑去。

常青走至中山公园西大门，望着“尾巴”的背影，嗤之以鼻进了公园，径自从东门经故宫午门顺着皇城根向沙滩红楼走去。

下午下了小雨，整个天空阴沉沉的，路面显得有些泥泞，路上的行人走得匆匆，有打着油布伞的，有穿着帆布雨衣的，有的穷学生索兴光着脑袋，腋下夹着书奔跑的，也有几个人力车夫抢着在这样的天气揽生意的……

贴着中南海西大墙六部口往北的府右小街，显得越发的清静，这里一边是森严的官府，一边是青砖瓦舍的民居。

今天，就在这条街上，从下午一两点钟，便有稀稀拉拉的人从南北两出入口进入中南海西门斜对过弯弯曲曲的饽饽坊，悄悄地推开8号门。

饽饽坊8号是个独门独院，也是北平中上等人家标准的四合院，门的两旁照样是雕花的石柱，跨过半尺高的门槛便是不大的门洞儿，门洞两侧是耳房，迎面是一座影壁墙，绕过去便是3栋青砖、鱼鳞青瓦的房子，窗棂挺大，设有台阶和雨毡。只因门的方位是东开，正房在左，对门的都是西厢。

除前天约的几位都到了之外，还有院子的女主人李常青的秘书刘孟云（原名首第模）同志。

李常青首先说：“今天的中心议题就是把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建立起来，另外再研讨一下几个党的外围组织组建方案。”

大家经过认真研究，市委由7人组成，并选举王学明为市委书记，彭涛、冷楚、谷景生等为执行委员。会上指定周小舟负责筹建“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北平分会”；黄敬、姚依林、郭明秋3人负责在学生中开展工作，并担负“学生联合会”的筹建任务；刘孟云除协助李常青工作外，负责妇女工作。

市委建立后，周小舟很快就把“民武会”建立起来，并打开了局面；相继又成立了“文化斗争总同盟”（包括“左联”、“社

联”、“艺联”、“音联”、“语联”等)、“赤色互济会”等各革命群众团体；还在大中学校成立了不少公开的合法组织，如清华大学的“现代座谈会”、北京大学的“帝国主义研究会”和“世界语学会”及其他大、中学校的“读书会”、“时事座谈会”、“新文字研究会”等，各校的学生会组织也先后成立。

这时，继北平市立第一女中停职令激起的风波后，又出现了“妇女回家”论的反动逆流。

“妇女回家”论本为舶来品。是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为其称霸世界而推行的“三K主义”。所谓“三K”即德文3个单词 Ki-iche（厨房）、kirche（教堂）、kahn（床铺）中的头一个字母。

自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以来，就将这“三K主义”“妇女回家”作为“礼义廉耻”德行中心准则的组成部分。

国民党刊物《正论》发表文章作“妇女回家”的诠释，说什么“在提倡‘礼义廉耻’，推行新生活之今日……一个妇女能叫一般人对她油然而生尊敬之心，一定是尽了责任的女子，或是孝女，或是良妻，或是贤母，都应当是守礼的妇女，是合于礼教的妇女。”

于是乎，卫道士者高叫：“不喜出风头者，只在家里不声不响之教养子女者方为优良女性所天赋之使命。”

别有用心者辱骂道：“在政治上最出风头的女性最是坏蛋，不足以代表新女性。”

.....

国民党“五大”宣言竟明文规定了在女子教育问题上提倡以培养贤妻良母为宗旨：

“发展女子教育，培养仁慈、博爱、体力、智识两俱健全的母性，以挽救种族衰亡之危机，奠国家社会坚实之基础。”

结果有人就明确提出：贤妻良母实是女子生活的终极态度，

也就是女子教育唯一的目标。

并提出具体方案：“女子中等学校以单独设立为原则。”

4月，北平市市长袁良向市政府会议提起取缔男女同校案：

要繁荣北平，须先从整顿男女风化入手……中学男女学生，正血气未定之时，同室教授，同校居住，影响学生修身向学之心甚大。拟自二十四年度起，一律分校教育。以维教育，而端社教……

市政府和社会局颁布命令，恢复女生班，开设“家事”课。很快，家庭烹调、室内布置、育儿、裁剪……充满课堂。

北平各校师生，纷纷拍案而起愤然提出抗议，并联合递交呈文请求收回成命。上海、江苏的妇女会也发来通电表示反对。

学生的不满情绪四处蔓延：“我们是为求学而来，不是为做饭而来”、“国都要亡了，哪有安稳的家？还给谁去做贤妻良母？”

“……”

妇女界齐声呐喊：在这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岂能允许“妇女回家”的谬论束缚我们的灵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女子岂能坐视不管？！

女一中、女二中率先摆脱贤妻良母的教育羁绊，在学校成立地下党组织，造就一批离经叛道者，悄悄走出校门，投身到救亡的热流中去。

舆论界声浪频起，极力支持妇女的呼声，推动妇女的抗争。

整个北平，学校、街道、胡同、四合院……到处呐喊着《妇女大众战歌》：

走出闺房、厨房，

从此不做小众的大司务，
去为大众煮饭、烧汤。
开放自己牢笼似的小家庭，
卧房、晒台、客堂，
冲上民族的战场！

就在这个时候，在一群中间分子中，面对“九·一八”事变以来，“领土一省又一省地被入侵占，人民千万又千万地被入奴役，城村一处又一处地被入干涉”的“国家将亡”的景象，加上失业失学的痛苦，感到民族、国家前途暗淡，个人出路渺茫，思想情绪陷入苦闷与彷徨。

国民党借此机会大肆散布逃跑主义。

资产阶级文人也乘机把“五四”时期的“破烂货”——“读书救国”论又端了出来，竟然喊道：“救亡的事情自有国家去管，学生只管读书”，“莫要受人操纵参加什么政治斗争，应抓紧时间学些救国的学问”……

面对妇女界、学生界自发而起的斗争，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及党的外围组织及时地予以因势利导，将学生运动引向救亡方面来。

只是身为市临委书记的王学明，显得有些不力，忽而冷然漠视，忽而又急于求功，未经集体研究和请示，竟擅自发动“红五月飞行大集会”，结果，由于时机不成熟，致使数百名青年学生被捕，有的已在狱中被暗杀。

5月末，“北平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纪英琦被叛徒出卖，再陷囹圄。虽经多次严刑拷打，始终没有暴露党的机密，使党所领导的反帝系统得以保存。这次党组织遭到的大破坏，共有40人被捕，当即被枪杀的4人，被就地判刑的32人。纪英琦等4人

被解往南京，押在军人反省院。

在东北大学文学院读书的李智得知“老大哥周化南被捕，本来就心急如焚，如今又听到这么多的同学遭到捕杀，再也不能自己了，他找到李万新，说：“你们北大是有影响的学校，应及时有所表态。快把各校串连起来，表示抗议才行，我们绝非令人宰割的羔羊！”李智握的拳头嘎嘎直响，牙关紧咬，腮肌不住地颤抖，他两眼冒火地说：“总有一天，我们要和宪兵三团算账，非把那个杀人的魔王蒋孝先干掉不可！”

“是的，蒋孝先手上沾满了烈士的鲜血，这笔血债一定要加倍地偿还。老叔，你方才所说的抗议这件事，我们北大已有此动议，你们东大快与城外燕大、清华几个学校联系联系，尽快表明我们的态度。”

“不过我又想，咱们这样搞对不对呀，可不能盲目出动，再造成流血事件……”李智突然又喃喃道。

“你这是怎么了，一会儿慷慨激昂，一会儿又打起退堂鼓。”

“不是打什么退堂鼓，”李智解释说，“我想，咱们是不是找一下常青哥，向他汇报一下，取得党的指示再干。”

“难道我们上次的‘飞行集会’不是在党的领导下吗？”

“那倒不是。但我怀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可又悟不出其中的原因，咱们反映反映还不好吗？”

李万新说：“也行，那就由你这个‘反帝大同盟’的盟员出面吧。”

“你不更好吗，我知道你已是党员了。”

“谁叫你是长辈呢，还是你去吧，小老叔。”

“你呀，真拿你没办法。”

不久，经市临委的指示清华大学等10校学生自治会联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争自由》的宣言，文中对国民党法西斯恐怖统

治给予严厉地控诉：

“……冀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30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

5月，还是5月！5月29日，日寇又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进入滦东“非武装区”，破坏“塘沽协定”，一方面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主任宋哲元提出各种无理要求，一方面调集大批军队入关，进一步威胁平津。

6月9日，签订了妥协投降的《何梅协定》，全部答应了日本强盗的要求。

根据这个协定，国民党政府取消了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了河北省内中央军、东北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了河北省主席和平津两市市长，撤销了国民党军委会北平分会的政训处，等等。从此，日寇便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实际控制了华北。

6月10日，蒋介石颁布了对日寇妥协退让，对抗日运动横加镇压的“敦睦邻邦令”。命令中规定：

“凡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反日宣传者，均处以妨害邦交罪。”

正当此时，上海《新生周刊》的总编辑、“九·一八”事变前当过张学良秘书，并与邹韬奋、章乃器等相友好的杜重远，在其所编的周刊上登载了《闲话皇帝》一文，被日本认为“侮辱天皇”，提出严重抗议，蒋介石政府连忙向日皇请罪道歉。将杜重

远逮捕，判处一年零两个月的徒刑。

从这以后，报刊上再也看不到“抗日”字样，而代之以“抗×”了

恰在这时，黄河又一次发大水，河南、山东大批灾民进至北平，饥寒交迫，流落街头，国民党政府不予救济，激起了广大社会人士的义愤。

李常青亲自撰写文章，在党的北方局，河北省委的秘密刊物《火线》上先后发表了《论黄河水灾与党的任务》、《防止水灾，首先打倒制造水灾的国民党》、《为江河大水灾告华北灾民劳苦群众书》等文件，指出水灾问题，是同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和奉行卖国投降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分不开的，号召民众自己组织起来防御水灾，进行自救。

这天，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在西山黄敬的一个亲属家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王学明、彭涛、周小舟、姚依林和黄敬。李常青也到会。

会上首先决定成立黄河水灾赈济会，作为市委领导下的一个公开合法组织，并提出，会将这个组织向北平市社会局备案，同时在校成立赈济分会，团结联系一批进步青年，公开进行募捐、义演，宣传救灾，宣传抗日救国。

接着，会议转入另一个议题。

只见李常青从怀里掏出两张报纸，展放在桌上，一张是吴玉章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一张是英文《国际通讯》。

“呀，太好了！”黄敬高兴地念起报上的标题来：“《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1935年8月1日”

李常青说：“黄敬，那就由你给大家读一下吧！”

同志们异常激动地聆听来自苏区党中央的声音。

当黄敬念到“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现在更进一步地恳切号

召”时，李常青说：“请你慢一点儿。”

黄敬一字一句，清晰而有力地念道：

“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

一切有爱国天良的军官和士兵弟兄们！

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的党派和团体的同志们！

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们！

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

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蒙、回、韩、藏、苗、徭、黎、畲等）的兄弟们！

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儿，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大家听着怎么样？”李常青打断了黄敬，让他暂时停一下，说：“这口号、这号召，鲜明有力，其中共有6个‘一切’，几乎方方面面都包括了。”

“可不，就连蓝衣社也包括在内呢！”周小舟补充一句。

“这说明我们党以民族大义为重，要建立一个更加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合乎当前的形势的，也是合乎民心民意的！”姚依林直率地谈出自己的看法。

“完全正确，同志们，我们应该调整一下我们的步伐，以党的这个《八一宣言》作为行动的指针、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把工作引向深入。”李常青的话音刚落，彭涛马上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

“我认为，临委会在前期工作存在着‘左’倾关门主义和冒

险主义，应该加以解决。”

周小舟说：“明确点说，王学明同志不能代表市委的意志，擅自发动什么‘飞行集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我的确辜负了大家的期望，”王学明诚恳地说，“我一直做共青团工作，对市委工作不太熟悉，本人能力也有限，很难胜任书记工作。这些天同志们也不断批评我，我虚心接受，为了今后工作，我提出辞职。”

“我看是不是先不要追究个人的什么责任，”李常青说，“重要的是肃清党内所存在的错误倾向，我想，这决非王学明同志一人所为，也不是仅仅因能力问题而导致，恐怕这是目前党内所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的确应引起注意。我认为我们这个临委会全体同志，工作还是有成绩的，但错误也是严重的。今天，同志们及时地把问题提出来是完全必要的。我同意周小舟同志改组临委建立正式市委的建议。”

“我赞成！”姚依林表态。

“同意！”黄敬说。

“同意！”王学明也表示赞同。

.....

大家公推李常青兼任市委书记。这次会开得圆满成功，每个人心情都很舒畅。

会后，在新市委领导下，通过“黄河水灾赈济会”推动了各校抗灾救亡工作。还派出同学带着捐款、实物和抗日宣传品分赴灾区，进行慰问宣传，但不久，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无理镇压，勒令解散。

.....

“何梅协定”签订之后，华北局势十分险恶。日寇大肆收买汉奸，策动所谓“华北防共自治运动”，阴谋成立“蒙古国”、

“华北国”，妄图制造一个“满洲国第二”。

9月25日，日寇驻屯军司令官表示：“华北一旦发生自治运动，日本愿意援助”，“任何中国人倘欲以武力防范自治运动，必将触犯关东军的兵力”。接着日本首脑又在大连召开军事会议，拟定了所谓“中日提携”的方案：“先将华北变为提携之模范，而后扩展至各地。”从此，在日寇的导演下，一幕幕丑剧紧锣密鼓地开场了。

10月22日，日寇制造了“香河事变”，煽动河北省东部的香河、二河、昌平、武清等县的一群流氓、汉奸发动所谓“饥民暴动”，袭击并占领了香河县城，成立了“县政临时维持会”的汉奸政权。

11月7日，在日酋土肥原策动下，宋哲元联合华北五省，脱离南京政府实行“自治”而“独立”。

日寇竟不损一兵一卒，不费一枪一弹，控制了整个华北。此时的华北，广大农村日益走向破产；平津城内，卖儿卖女、沿街求乞，比比皆是，学生在“毕业即失业”的威逼下，生活没有出路。

北平，这古老名城，已临危欲摧：城门洞口、大街小巷，全都布满日军的岗哨。兽蹄所到之处，鸡犬不宁，民不聊生。在光天化日之下，日军竟在东安市场鸣枪抢劫。日本浪人随意绑架女学生，拖到中山公园经百般污辱后，用手帕塞口，缚住手脚，丢到假山后边的池塘里。国民党的党政人员及其家属，集聚前门车站，争相南下。各大学当局纷纷准备撤退，清华大学要迁长沙，东北大学要搬太原，教育界正准备上“最后一课”。城里人心慌慌，传闻纷起，早上听说下午日军要占领北平城，下午又传着晚上就要开进来，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就在这“爱国有罪，冤狱遍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

庆，中华民族面临亡国亡种的严峻时刻，每一个爱国者都在寻找挽救祖国危亡，寻找民族出路的问题答案。青年学生对国事甚为敏感，“满耳是大众的嗟伤，一年年国土的沦丧”、“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青年学生激昂地高唱流行歌曲《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目前，抗日救亡，已成为青年学生和全国人民一致的呼声，革命运动的时机日趋成熟，但还不是很成熟，还需要我们做些艰苦的工作。方才黄敬同志在汇报中提到在一部分学生，包括一些大学的教授还处于彷徨之中。有的人甚至受到国民党分子散布的逃跑主义影响，想退到云南、贵州去；有的对日寇的凶残和国民党的血腥镇压也产生恐怖心理，幻想逃避斗争。针对这些思想，我们要通过群团组织在广大民众中进行大量的团结教育活动，还可以利用大、中学校公开合法组织开展活动，发挥党团员和盟员的作用，领导大家讨论‘中国这样发展下去前途如何？’‘华北是否名存实亡？’等问题，还可向学生提出具体的问题供大家讨论。如：‘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步步退让，当前国难重重，能不能安心读书？’‘国家这么黑暗，青年人应该怎么办？’引导大家讨论当前国际形势，认识世界人民强大的反帝力量。可以列举像阿尔巴尼亚以 800 万人民的小国，却英勇地反击了意大利帝国主义的侵略；西班牙的青年与人民，对德、意的野蛮侵略进行前赴后继英勇斗争的实例来教育师生、工农民众，铲除怯弱心理，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抗日觉悟。”河北省委特派员兼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李常青同志在饽饽坊 8 号的西厢房里对市委及各民团负责人部署了下一阶段的工作之后，回头向他的秘书刘孟云说：

“当务之急是把《八一宣言》和原北方局办的《火线》、《民族战旗》、《实话报》、《华北烽火》和《国防》等刊物尽快发放

下去，加强传阅和辅导，还可求助些进步教授做些讲座，中国学院的杨秀峰、黄松龄，还有齐燕铭几位教授早有这个愿望。教授的话比起我们更有力，我们要多聆听一下他们对时局的看法，了解一下他们的情绪，做些他们的工作。”

“常青同志提的很及时，清华的朱自清教授前几天就提出能否招集几位教授一起恳谈一下，并欢迎学联也派人前去参加。”刘孟云报告了这样一个消息。

“那好哇！”李常青听说朱自清先生有这样的动议很高兴，“他是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如果朱先生能站出来对学生予以同情与支持，那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样罢，你和郭明秋先去联系一下，我很愿意和他谈一谈。”